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第三辑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 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



付义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第三辑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 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



付义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 / 付义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310 - 6

I. ①中… II. ①付… III. ①民工 - 言语 - 研究 - 中国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0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获以下资助，特此致谢：

·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项目批准号：11YJC740026）

- 集美大学出版基金
-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基金

总序：在遥远的海滨

苏 涵

展现在您面前的这套丛书，是由一个居住在遥远海滨的学术群体——集美大学文学学院的教师致力于各自学科的研究，近期所推出的部分学术成果。这套丛书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若干学科方向，分界交融，见仁见智，各立一说，从不同角度体现着这个学术群体所作出的勤劳而智慧的工作。

这套丛书之所以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版，并且冠以“集美大学文学院吕行健学术丛书”之名，是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是由吕行健先生捐资设立的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基金资助出版的。吕行健先生是集美大学文学学院的校友，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来求学于北京，驰骋商海，再将自己所获得的财富回报于母校，支持母校的学术事业，其行其意都令人感佩。

当然，不论是这个学术群体所作出的努力，还是吕行健先生对母校学术研究的支持，都与集美大学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远在1918年，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就在他的家乡——集美创建了集美师范学校，1926年又在集美师范学校设立了国学专门部，我们将此视为集美大学的前身。虽然，那个时候，这“前身”仅仅是师范学校的格局，而非陈嘉庚先生期望的“大学之规模”，但是，却有着卓越的教育理念与学术思想。这些，都绝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同等学校可比拟，甚至值得我们今天具有“大学之规模”的诸多学校管理者借鉴与思考。

在当时的集美学校，校主陈嘉庚先生不仅倾尽自己在海外经营所获

得的财富，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倾力支持集美学校的发展，而且倡导以最优厚的待遇聘任优秀教师，支持他们的学术研究。先后聘任过诸如国学家钱穆、文学家王鲁彦和汪静之、教育学家朱智贤和罗廷光、哲学家王伯祥和杨筠如、生物学家伍献文、经济学家陈灿、地理学家盛叙功等到校任教。这些或盛名于当时，或享誉于后世的学问大家，在这里教书，在这里做学问，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人才。翻开至今保存完好的当年出版的《集美周刊》，几乎每一期上都刊登了当时师生的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学术活动与教学活动的报道，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感受到朴实而充满灵性的学术研究品格。

20世纪50年代之后，陈嘉庚先生创建并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集美学村里门类众多、规模巨大的所有学校，逐渐归属于国家所有，并以“大学之规模”迅速发展，才有了今天作为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之一的集美大学，也才有了今天正在蒸蒸日上的集美大学文学院。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的教师融洽相处，切磋砥砺，致力学问，锐意进取，不断提高着自己的学术境界，也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学术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学院已经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一大批颇具影响或崭露头角的优秀学者。他们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国戏曲文学、古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西方小说史、英美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批评、现当代纪实文学与乡土文学、应用语言学、文字学、方言学、文艺学基本理论、民间文艺学等研究方向上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学术群体有着非常明晰的学术发展理念，那就是：以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研究为主体、为根基，做扎实的学问；以现实文化问题研究为辅翼、为延伸，增强学术研究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可能。在这一学术理念的引导下，我们近年不仅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项目，而且获得了来自社会的有力支持，正在开展着大方向一致而又丰富多彩的各种系列研究。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决定组织出版全由我们教师自己研究而推出的“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我们计划，这套丛书每年一辑，每辑可以根据情况编排不同的数量。而每一辑的丛书，既可能是不同作者在不同方向上的撰著，也可能是围绕相同或相近方向不同作者各抒己见。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它成为一个见证，从一个角度见证

我们学院教师的学术努力，见证我们不断向更高境界前行的足迹。

我们不可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某一个层面上，维持现状，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向自己挑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学术上的真正创造和持续发展。

虽然我们遥居海之一隅，但是，这里不仅有着由陈嘉庚先生亲手创建并在后来日益扩大、愈臻优美的校园，而且有着陈嘉庚先生用一生的言行所体现的伟大精神为我们注入持久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一定能够不断地达到我们追求的一个个目标。

从集美大学文学院的楼顶望去：近处，红顶高楼林立于蓝天之下，湖泊花园散布于校舍之间，白鹭翔集，群鸟争鸣，正乃自然与人文交融为一的景象；远处，蓝色大海潮涌于鹭岛之外，连通着广阔的台湾海峡，交汇汹涌的太平洋洋流——有时暖气北上，幻变成风雨晴阴，有时台风遥临，呼唤出万千气象，恰是天地造化之壮观。置身于斯，不生江湖之远的感慨，反而令人常常想起李白的名句：“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是为序。

2012年6月29日

于集美大学文学院

自序

本来想随个俗，请自己的老师或者其他有名望的学者作个序，以提升一下本书的人气。但一想到作序者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此书，都要耐着性子看完，无论此书写得好不好，都要碍于面子夸上一通，甚至还要提心吊胆地为书中可能的错误担责，我就有些过意不去，想想还是不要为难别人了，自己给自己作个序吧。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魏礼群（2006）曾如此说道：“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然而，我开始关注农民工时还未意识到农民工议题竟然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我只是出于对这一群体的熟悉、关心才对它产生研究兴趣的。本人成长于安徽中部一个普通的村庄，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农村有两样事闻名全国：一个就是凤阳人率全国之先搞的“大包干”，另一个就是进入城市打工的“小保姆”。我所在的那个村子，当时就有几个做保姆的年轻女孩。她们是那个村子最早的一批农民工，之后陆陆续续的，村里的男人们才开始进城打工。到90年代后期，进城打工在村里渐成风气，直至今天全村已有40%多的人都在外打工，打工早已成了这个村子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当初没有考上大学，今天的我一定也会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就像我的姐姐、哥哥、亲戚、同学们一样。当身边有如此多的人、如此亲近的人都在这个群体中时，你就不能不关注它，而当你从事的又是一份社会研究工作，那么将这种关注转化为研究就再自然不过了。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几乎和这个群体的出现一样早，但关于农民工的语言学研究则比较晚，从公开发表的文献看，直至2004年才开始有这方面的研究。经十余年的发展，“农民工语言研究”在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学习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甚而成为中国社

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热点”。不过，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1996：1）说过，“一门科学的进步，其标志是它所研究的问题不再原封不动”。对“农民工语言研究”而言，若要更进一步，显然也不能原封不动，而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在此过程中，社会学关于农民工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早在2001年，中国社会学界就已展开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与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以及我们关于这一群体的很多知识基本上都来自这一领域所做的很多工作。当然，社会学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并不仅仅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即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新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成长为这个群体的主体，农民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演变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同理，无论从学科本身的发展需要，还是现实的需要，中国社会语言学关于农民工的研究都不能不将重点转向新生代农民工。

然而，即便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仍旧是“农民工”。“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说其“农民”，他又不在农村生活，不在田地务农；说其“工人”，他在城里又被视为“农民”，不能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享受同等的福利与待遇。因此，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认同模糊的群体，无论是社会学的研究，还是本书的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点。但问题是，这样模糊的群体究竟如何影响他们的语言使用呢？无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还是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学者们都将语言视为认同的符号。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确实利用自己所用的语言向对方表明或暗示“我是谁”，诚如赫德森（Hudson，2000：231—232）所言：当你在说话时，你的说话方式实际上就在传递“面子”，说白点，就是你想让对方认为你是何种人。

研究之初，我们曾以为农民工是以普通话或老家话作为自己的社会认同符号：越是认同城市，就越有可能使用普通话；越是认同农村，就越有可能使用老家话。同时还以为，新老农民工会因此表现出这样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更认同城市，因此更有可能使用普通话；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更认同农村，因此更有可能使用老家话。设想看似理所当然，但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无论新老）并没有以普通话或老家话作为自己认同城市或农村的符

号，新老农民工无论在语言的使用上还是在对城市或农村的认同上都是大同小异，至少没有出现我们曾设想的那种差异。当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要否认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农民工还有可能以语言系统中的某个（些）元素（语音、词汇或语法的）来表达对城市或农村的认同，也有可能以普通话或老家话作为其他社会认同的符号，例如，大量研究显示农民工会以老家话作为地域认同的符号。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新老农民工有着如此相象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呢？我们认为，这或许源于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着相同的地位和处境。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便开始实行城乡分治，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即便是改革开放后这种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未真正被打破，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仍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施行城乡区别对待、地域区别对待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进城的农民工无奈地背负着“农民”和“外地人”的双重身份而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从事着城里人或当地人一般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甚至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歧视。对农民工而言，他们主要是因为农村的落后、贫穷而来到城市的，如果说农村生活的诸多艰辛让他们难以形成农村认同的话，那么城市生活的万般辛酸也同样让他们难以形成城市认同。他们处境尴尬，实际上是一群既不能回归农村又不能融入城市的“双重边缘人”，而当这两种相互区别而存在的认同没有在一个群体中确立起来时，自然也就谈不上对该群体的语言使用有什么影响。综合诸多研究来看，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是出于一些实际的利益诉求来使用普通话或老家话的：普通话是他们在城市拓展事业、方便生活的有利工具，而老家话具有密切乡邻的潜在价值，是他们精神孤独或孤立无援时寻求老乡支持和帮助的有利工具。也正因为如此，普通话主要用于农民工的外部交际，老家话则主要用于内部交际，二者各司其职，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不得不说，我们的发现并不是关于农民工群体的最终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只是基于这一群体中极少一部分样本的调查而得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能作为农民工总体的一种推论。事实究竟如何，还得需要更多的学者组织起来以更加科学的方法对更多的农民工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调查、分析，最后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我们的结论，都将意

味着我们距离“真实”又进了一步。本人期待这样的局面早日出现，在此真诚欢迎各位同仁不仅能给予本书宝贵的指导与批评，而且能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农民工的研究中，为国家顺利解决农民工问题贡献一分力量。

付义荣

2015年11月14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7)
第三节 结构安排	(10)
第二章 社会认同理论	(12)
第一节 社会认同理论的演变	(12)
第二节 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内容	(20)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视阈中的社会认同理论	(27)
第三章 研究设计	(36)
第一节 主要变量的测量	(36)
第二节 数据来源	(42)
第三节 主要统计方法	(44)
第四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50)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及习得	(50)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57)
第三节 中国农民工的语言使用现状	(61)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72)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	(72)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	(80)
第六章 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的相关性及其解释	(94)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的相关性	(94)
第二节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的解释	(107)

第七章 结语	(130)
附录 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和语言使用状况问卷调查	(138)
参考文献	(143)
后记	(160)

第一章 导言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非农行业，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农民工。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或者说如何让城镇真正接纳农民工，将是当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强国转型的成败。为此，从政府到社会都在关注这一群体的发展，农民工问题亦早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 research 热点。近几年来，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和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从中得到的数据和结论很好地弥补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关于农民工的认识，使我们对农民工的了解更加全面而深入。然而，农民工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群体，经约 30 年的发展，如今的农民工已经是一个以新生代为主的群体。因此，关于农民工的任何研究都需要适应农民工群体的这一新变化，开始向“新生代农民工”聚焦，社会语言学也不例外。本课题正是这样一次尝试，并且选择社会认同这一视角来对该群体的语言使用进行描写和解释。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一词始于何时何处，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按《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其又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情况，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还包括在县域内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简单点说，农民工就是“离土

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农民。相对而言，狭义上的农民工，即“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由于规模大、流动性强，对交通、治安、社会管理等产生了一系列更为显著的影响，因此产生的问题会更多，受到的关注也最多。包括社会语言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此类农民工，这也是人们对“农民工”的最普遍理解，本课题也将着眼于这部分身在异乡的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新生代。

从已有的文献看，早在 2000 年，就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新生代农民工。不过，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所用的名称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而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笔者以篇名中含有“新生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方式在中国知网上搜索 2013 年及之前发表的论文，通过一番甄别，共获得 4100 篇相关论文（具体数据见表 1.1），这些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现状。

表 1.1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文献之搜索统计情况一览

年份	搜索词（篇名）		年份	搜索词（篇名）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2000	0	1	2007	49	0
2001	0	1	2008	54	0
2002	0	1	2009	81	0
2003	0	2	2010	682	0
2004	0	2	2011	1080	0
2005	9	0	2012	1101	0
2006	32	0	2013	1003	2

由表 1.1 来看，在所有 4100 篇论文中，只有 9 篇使用的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称谓，所占比例只有 0.22%，且基本上都出现在 2004 年及之前的文献中，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大致是于 2005 年开始定型并逐渐流行起来的。从各年份所发论文数量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是逐年增多的，尤其 2010 年最为关键，该年的论文数一下子猛增到 682 篇，是上一年的 8 倍多，比之前所有年份的总和还要多。之所以如此，或许和中央的高度关注有关。2009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2010 年的一号文件，即《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在该文件中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而这样的关注显然又与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变化形势有关。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1453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就有8487万人，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而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2015年第3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增至17554万人。^①即便按原有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据估计也应在1亿人之上。可以说，经约30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而在这样的代际转换中，或许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从而会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造成这样或那样未知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如今，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增多，“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内涵迄今并未完全统一。在王春光的《新生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求》（2000）、《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合的关系》（2001）等文中，“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而言的，主要指90年代初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董海军（2006）则将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朱永安（2005）、赵岚（2007）、陈兰（2010）等人说得比较具体，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8）、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都将16岁以上的“80后”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其中后者还添加了一个限制：“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农业部长韩长赋（2010a）则将“80后”“90后”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www.stats.gov.cn）。

(2011: 130) 将 1980—1994 年出生的、年龄为 16—30 岁的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2011) 则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 1980 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综合这些界定, 各家基本上都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于“80 后”农民工, 所不同的只是在于是否外出、是否年满 16 周岁上。前文已指出, 外出农民工规模大、流动性强, 一开始便受到我国政府、社会的高度关注, 也是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研究的重点, 而未满 16 周岁的农民工属于非法用工^①, 只是农民工中的极少数现象。鉴于农民工的这一实际情况, 本课题将继续沿用国务院研究室关于“农民工”的狭义定义, 并将其中 1980 年及之后出生、年满 16 周岁以上的人员视为“新生代农民工”, 亦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 户籍在农村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实际上, 这也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即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学者和研究机构, 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彼此有别, 但在实际操作时所选择的调查对象仍旧是这部分年满 16 周岁的“80 后”外出农民工。

不过, 当前热闹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高度集中于社会学领域, 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 还是我们对该群体的实际了解, 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一领域 (储卉娟, 2011)。表 1.1 所列的四千余篇论文中, 仅有一篇牵涉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 即陈晨的 (2012) 的《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建构: 语言认同视角》。该文作者采用蹲点调查的方式, 在广东东莞市对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访谈, 试图从语言认同的视角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运用语言来适应城市生活, 学习地域文化并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建构, 从而深化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这一问题的理解, 并且对社会结构变迁与群体命运的关系加以剖析。很明显, 这仍是一篇社会学研究, 其目的是解决社会学的某些问题, 而不是探讨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 从 2004 年起, 社会语言学家们便展开了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和研究, 他们在话语分析、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学习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直至 2012 年, 社会语言学界才开始出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与研究。2015 年 3 月 29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章第十五条之规定: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